

# 第一次跳伞腿软得站不起来

我1961年参军入伍。那时,我们家里兄弟姐妹7个,父母养活我们压力很大。恰逢相关部门到学校征兵,我就踊跃报了名。到部队后,我成为一名空降兵战士。

我们那批新兵一共1000人,先被安排去练跳热气球,然后再练习跳伞。由于条件限制,部队没有专业的跳伞平台,跳伞训练只能借助热气球开展。一个热气球要搭载一名教官和三名学员,通过钢索上升至空中再跳下。第一次跳伞的经历,我终生难忘。当乘坐热气球上升到10米高度,我就不敢往下看了,毕竟在陆上生活了20多年,突然到了天

上,心理上很难适应。等到离地400米的跳伞高度,我吓得不敢睁眼,双腿也开始发软。教员在我们耳边大声喊:“不要害怕,大声唱歌!”这是为了让我们放松一下,壮壮胆。可我们太紧张了,根本唱不出来。第一个跳的同志腿软得站不起来,教员只好抓起他的肩膀,把他拽起来。我是第三个跳的,也是被教员拽起来的。载着我们的篮子在热气球下晃悠悠的,我踏上篮子边的木头踏板,眼睛都睁不开。终于,鼓起勇气往外一扑,一跃而下。耳边的风呼呼地响,好像掉进了万丈深渊……不知过了多久,只听“哗”的一声,降落

伞打开了,我心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越过心理障碍后,我的跳伞高度和跳伞频率开始不断增加。几轮练习淘汰下来,当初的新兵共留下5人成为空降兵教员培养对象,我是第一批被选上的。入伍后仅仅一年,我就当上了跳伞教员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国和法国、意大利等国家军事交流相对广泛和频繁。1985年2月,我作为某师代师长,随空军代表团一行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先进空降经验。在法国空降兵学院参观时,我们提出想与学院官兵一起乘机跳伞。对方用C160飞机载着60多名教员、学员

飞到400米低空参加跳伞。法国的伞跟我们的伞不大一样,我们的伞只有一个排气孔,确保相对安全。法国的伞有3—4个排气孔,可以顺风,也可以逆风,比较灵活。着陆也不像我们要求的三点并住着陆,最好站住或跪下,他们侧重于要求前滚翻、后滚翻着陆。尽管有差异,但作为中方考察团代表,我和伞训处处长两个人成功降落。那时候,与法国和意大利相比,我们在训练的基地化、模拟化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。那段学习交流的经历让我们印象深刻,也从中学到很多。(口述/山东日照 董永志 整理/陈潇 冷炳豪)



## 一块花布娶新娘

“文革”期间,我1968年12月大学毕业。这年12月15日,我从学校赶回家,告诉父母:“学校让我12月31日就去张家口市怀安县报到。我想这次回来跟未婚妻石玉香结婚,你们操持一下吧!”父母完全同意,就开始操办我的婚事。

我和玉香经人介绍认识,彼此一见钟情。我将介绍人找来,让他通知玉香——她家距我村有18里地。12月18日上午,娶亲官客(男方到女方家接新娘子的人)用自行车将玉香带到我家。中午,我家办了一桌宴席。宴席上有媒人、官客、主婚人等,一共8人。饭吃罢,我俩的结婚仪式就算结束了。我们结婚就这么简单。玉香家也没要彩礼,我们仅仅给她买了一块花布。她自己做了一件花棉袄穿在身上,就心满意足啦。(河北唐山 张顺 84岁)

## 为一分钱鞠躬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上初中。那段时间,我发疯般迷上了集邮。家境贫寒,我口袋里每月零花钱不超两元。为了集邮,我不得不舍弃小人书、绘画等爱好,节约每一分钱。

一天,我看中的一种邮票仅剩一套,而我摸遍口袋,还差一分钱。眼看其他邮迷也有意购买,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排在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男士看出我的窘迫,主动替我补上了一份钱。一时间,巨大的感动将我击中,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深鞠一躬。接过邮票后,我第一时间递给他分享。看得出,他眼神中也有不舍,但更多是助人的慈祥与快乐。

来自陌生人的这份关怀和帮助,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一段美好,温暖了一生。(湖南永州 蒋平 54岁)



## 庆祝学校更名



1977年恢复高考,河北省保定师范学校增招大专班,我有幸被录取。当时,我们睡着用木板拼成的大通铺。给我们授课的,是从县中学上调的高中教师和从河北大学借调的教授。虽然条件差,但我们学习积极性都很高。

1978年,经教育部批准,我们学校更名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。为纪念学校更名,我(上图前左)和王九生、张时雨、李鸿飞、郑克才等几个要好的同学,拍摄了这张照片。(河北曲阳 彭英凯 77岁)

## 征稿

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,这些人生节点中,有哪些难忘的故事?“当年”版“整十人生”专题欢迎您投稿讲述。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

## 人生第一件大事:拆洗棉被

1965年,我考上辽宁沈阳一所大学,妈妈给我做了一套新被褥。那个年代,布和棉花都要凭票证购买。妈妈设法凑齐了布票和棉花票,买来布和棉花,很快缝制完成。

入学后,从秋天到冬天,再到春暖花开,我都盖着那床新棉被。被子没有外罩,有点脏了,我计划着在一个晴朗的周日拆洗棉被。对我来说,这可是一项大工程。因为,在家里时,拆洗棉被都是妈妈做的活。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事,我找了两位熟悉拆洗被子的女同学,商量好一起拆洗棉被。

那天,我们分头拆了棉



隋淑芬(左)和大学同学

被,把棉花放在太阳底下晒,把被里被面放到盆里洗。洗过后,白被里洁白如新,花被面清洁干净。然后,用开水把买来的淀粉冲泡成稀浆,把被里泡在稀浆里,让被里均匀地挂上一层浆,再搭起晾干。被面不挂浆,直接晾晒干。妈妈拆洗被子时,还要把晒干的被里折成

长方形,放在一个石板上用棒槌反复捶打,直到被里没有一点皱褶为止。我们在学校里没有这个条件,就省了这个步骤。被里被面都晒干后,我们开始缝制棉被了。我们找了一个乒乓球台,先把白被里铺在底下,把棉花放在上面,再把花被面布铺在棉花上,便开始缝制了。

在一天内,我们三个同学轮流着把棉被拆洗缝制完成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做的第一件大事。在远离父母的异乡,我感觉自己又长大了一些。(天津 隋淑芬 78岁)

## 通宵排队买火车票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和爱人离开上海到江西工作,每年春节乘火车回上海和父母团聚。那年头,购买返程火车票成了一大难题,得通宵熬夜排队。

当时,一过大年初三,买车票的人就多了起来。人们素质较高,都会主动排队。但是火车票有限,需求的日期很集中,所以购票的难度挺大。铁路部门规定只能提前售四至五天的票。早晨8点开卖,紧俏地方的火车票,常常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就售罄。不得已,

我们就在前一天的傍晚到售票大厅排队,苦熬整整一通宵,这样在次日早上能买到票。

起先几年,都是我去排队。后来,老妈心疼我,叫我弟弟上半夜排队,等我睡到凌晨两三点钟时去替换。夜里,售票大厅寒气逼人,得穿着厚厚的大衣或棉袄来抗寒。大厅内没有椅子凳子,就拿一叠旧报纸垫在地上,或者靠在大厅的墙角落打盹。后几年,我们学乖了,自带小板凳坐着。

整整一个通宵,实在难熬。我会带本小说消遣,但是灯光昏暗,很难坚持,只好和身边的同龄人聊天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,常常会聊出多年未曾见面的老同学、朋友。于是,陌生人越发亲近,漫漫长夜不觉得长了。

次日一早买到车票后,真的如释重负。奔出大厅转身拐进弄堂口的饮食店,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咸豆浆,加上大饼包油条,一夜的疲倦全被驱散了。(上海 陈泽锋 76岁)